京官名宦与惠州 1

统筹策划/陈骁鹏 马勇

编者按

从隋代驸马柳述开始，地处岭东、古称“循州”“祯州”的惠州就不断迎接来自王朝行政中枢的京官名宦。在他们的推动下，惠州日益崇文重教，从化外之地逐渐变成诗情缭绕的人文名城。

这些先贤来惠原因多样：或左迁至此，像唐代有三位宰相寓惠，苏轼左迁惠州两年零七个月，写下诗文近600篇；或转战至此，如文天祥毁家纾难、领兵勤王，为惠州留下正气与丹心；更有本地士人出仕京城后再度返乡，像明代大儒张萱，“草衣木食轻王侯”，在惠州开门收徒、著书立说。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究竟是怎样的魅力，让他们在惠时文思泉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羊城晚报·惠州文脉》推出《京官名宦与惠州》栏目，梳理古往今来的京官名宦与惠州的关系，本期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唐宋两朝……

“岭南万户皆春色”“此邦宜住玉堂仙”

唐宋两朝有27位京官迁惠州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宋绍圣元年，苏轼谪居惠州，在来惠路上听人介绍惠州风物之美，欣然写下诗句：“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这“香案吏”“玉堂仙”分别是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的雅号。确实，除了苏轼之外，唐宋年间还有众多京官因各种原因到惠州“插队落户”。

从唐宋两朝开始，谪官文学和谪官助学，成为古代惠州文化教育史上的独特景观。刘禹锡、陈尧佐、苏轼、唐庚和陈鹏飞等，就是这道景观上空熠熠生辉的“文曲星”。他们助教兴文，为惠州和中原搭起了一座文化桥梁。

插图/杜卉

壹 谪官南来提升了惠州知名度

惠州地处粤东海隅，交通不便，唐宋前常被中原人认为是蛮荒之地。加上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气候又与岭北有很大差别，官员来此多为谪居，往往谈粤色变。当然，也有不少寓惠官员对惠州山川民俗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比如陈尧佐和苏轼。

大批朝廷贬官的到来，客观上为儒学在惠州的传播提供了优质师资和示范文本，他们与地方学子交流互动，共同推进文化教育的发展，构成了惠州唐宋时期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将唐宋两代谪居惠州之较著名者简单列举出来，就足有27位。他们或高居朝廷要职，仅宰相就有三位；或出身官宦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不少人与文化界交往密切，或者自身就是全国性的文化名人。

他们以特殊的身份和原因走进惠州，引起了仕宦阶层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惠州的名声也因此逐步走向全国，吸引了中原士人的视线，成为他们了解和描述的对象。

自京官谪居惠州，唐人作品中关于惠州的记述日渐增多。据粗略统计，《全唐诗》中提及循州（即今惠州）的有6首，提及博罗的有5首，提及罗浮的则有60多首，这是惠州知名度不断提升的一个明显标志。

贰 岭东山姜花传递情谊至京城

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诗集中有多首与官谪惠州的人事有关，《崔元受少府自贬所还遗山姜花以诗答之》即是其中的一首。崔元受曾任行营粮草督办，唐元和年间因事贬为博罗尉，赦还时带了一些土产山姜花回长安分赠亲朋。刘禹锡收到礼物写诗答谢，开头便是：“故人博罗尉，遗我山姜花。采自碧海上，来自谪仙家。”因有了这首诗，山姜花得以“传名入帝里”。

后来，广州司马刘恂在《岭南录异》中对山姜花作了专门介绍，人们因此认识山姜花，也因此花更了解博罗。苏轼在惠州写信感谢博罗县令林抃馈赠杨梅时，就特别抄上刘禹锡这首诗，说：“闻山姜花欲出，录梦得诗去，庶致此馈也。”苏轼对山姜花有如此兴趣，无疑也是受唐人作品影响。

此外，刘禹锡的《罗浮山夜半见日》诗亦为墨客骚人津津乐道，及至宋代，“罗浮见日”已成典故常被诗人文士引用。裴夷直、施肩吾、李群玉、曹松、殷尧藩、卢纶等唐代诗人，在各自的作品中描述古循州“地说炎蒸极”“瘴雨出虹蝀”“犀象满城邑”的生态环境以及“越女收龙眼，蛮儿拾象牙”的地方风俗。刘恂《岭表录异》还记录了古循州“野象牙小而红”“循人争食象鼻”及用枹木作油画履等风物。

唐人的这类作品，文字优美，形象生动，起到了向外界宣传惠州的作用。

叁 柳宗元苏轼同书罗浮仙境

历代寓惠者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当数苏轼，他谪居惠州940天，写下各类作品近600首（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人文风物等，在当时已盛传于海内外。其中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成了岭南风物千古不易的广告词。

很少人知道，苏轼与唐代诗人柳宗元在不同时空里“共同”描绘过罗浮仙境。柳宗元所撰《龙城录》记述了一则隋代赵师雄游罗浮在梦中与梅花仙女相遇的美丽故事。苏轼初到惠州时也曾写下几首咏梅诗，诗中有道：“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又说：“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

有论者指出，苏轼这是暗用了赵师雄“罗浮梦梅”的典故；也有人认为，这是宋人假托柳宗元之名而作，专门为苏轼这几首著名的咏梅诗提供浪漫奇幻的故事背景。无论如何，自苏轼之后，“罗浮梦梅”的典故便频频出现在我国的诗词文赋中，罗浮山也因此有了广植梅花的“梅花村”，凡游罗浮的文人骚客，大多会前往探胜寻幽，抚今怀古。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山语》中介绍：“梅花村……人多以艺梅为生，牛羊之所践踏皆梅也。冬春之际，以落梅酷酒，于村南麻姑酒田卖之。一茅茨有碑曰：‘师雄梦处’。”可见，直至清代，罗浮梅花村在扑朔迷离中充满着诗情缭绕的人文气息，为游客所向往。

肆 宋代宰相言必称惠州山水

在宋代谪官中，积极向外界宣传惠州的，陈尧佐是较早的一位。北宋咸平二年（999年），陈尧佐以太常丞典祯州（今惠州）。他酷爱惠州溪山胜景，于府署东侧临江处筑野吏亭并一再题诗；又“召画工，相与立山之阳，审望详视，作罗浮图”。后来他入宰朝廷，与宾客论天下奇胜必称惠州山水。

另一位北宋诗人唐庚谪居惠州近五年，所作诗文300余篇，“曲尽南州景物，略无迁谪悲酸之态”。写风景如“水裁偏岸直，云截乱山平”，“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写市况如“道路鱼盐去，樵苏竹木还”；写人情如“蟹黄嗔止酒，鸡白劝加餐”；写风物如“笋蕨春生箸，鱼虾海入盘”，“竹根收白叠，树杪得黄封”；写节俗如“残梅诗兴晚，细草梦魂春。挑菜年年俗，飘蓬处处身”等等，皆隽永有味，像一幅工笔彩绘的长卷图画，形象细微地展示了北宋年间惠州古城的风土民情。

除了诗词歌赋，还有谪官为惠州出版集子。南宋崇政殿说书陈鹏飞，因忤逆奸相秦桧于绍兴年间贬逐惠州。他在归善县城铁炉湖居住直至病逝，著有《罗浮集》十卷及《书传》《诗传》等经术著作。南宋嘉定年间太学正王胄被劾判惠州，他在此编纂了《罗浮图志》一书，“一草一木、一禽一虫之有异于人间者，靡不详访而备录之……”

此外，北宋诗人彭汝砺、刘贡父，抗金名将李纲，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和刘克庄、词人白玉蟾、也先后踏足惠州，写下不少好作品。

唐宋两代谪居惠州著名官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官职	寓居惠州时间	备注
1	张锡	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武则天天授元年（691）	流循州
2	章玄同		武则天天授年间	坐请还庐陵王流循州
3	闾丘均	太常博士	唐景云元年（710）	贬为循州司仓
4	刘宗器	左卫率府胄曹	唐开元十五年（727）	贬为循州怀安戍主
5	韩浩	万年主簿、宰相韩休子	唐天宝十一年（752）	流循州
6	赵纵	大仆寺卿、郭子仪婿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	贬为循州司马
7	浑镐	义武军节度使	唐元和十三年（818）	贬为循州刺使卒于任
8	崔元受	行营粮草督办	唐元和六年（811）	贬为博罗尉
9	陆慎余	法曹	唐元和六年（811）	流循州
10	李道古	左金吾大将军	唐长庆元年（821）	贬为循州司马
11	柏耆	谏议大夫	唐太和元年（827）	贬为循州司户
12	杜元颖	西川节度使	唐太和三年（829）	贬为循州司马卒于任
13	段嶷	右金吾大将军	唐太和九年（835）	贬为循州司马
14	窦绷	宰相窦易直子	唐太和九年（835）	贬为循州司户参军
15	牛僧孺	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唐会昌四年（844）	贬为循州长史
16	郑亚	监察御史、给事中	唐大中二年（848）	贬为循州刺史卒于任
17	崔沆	中书舍人、宰相崔铉子	唐咸通十三年（872）	贬为循州司户参军
18	郑元规	刑部尚书	唐天祐元年（904）	贬为循州司马
19	陈尧佐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宋咸平二年（999）	祯州知州
20	苏轼	端明、侍读学士	宋绍圣元年（1094）	惠州安置
21	唐庚	提举京畿常平	宋大观四年（1110）	惠州居住
22	徐秉哲	中书省	宋绍兴二年（1132）	博罗居住
23	岳霖	岳飞子，受其父拖累，同行有弟震及妻女，见《夷坚丙志》卷十五	宋绍兴十一年（1141）	羁管惠州
24	安诚	右迪公郎	宋绍兴二十年（1150）	除名编管惠州
25	陈次升	侍御史	宋崇宁年间	除名编管循州
26	陈鹏飞	崇政殿说书	宋绍兴年间	贬居惠州
27	王胄	太学正、博士	宋宝庆三年（1227）	劾判惠州

制表/杜卉

文脉故事

唐代有三宰相寓惠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很少惠州人知道，从唐代开始，就有不少京官、名宦谪居惠州，这其中包括三位宰相。一个是武则天的左膀右臂，一个是“牛李党争”的首领，另有一位宰相甚至逝世于此。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专家何志成介绍，从初唐武则天开始，朝廷先后将张锡、杜元颖、牛僧孺三位宰相及郭子仪女婿赵纵、义武军节度使浑镐、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少府崔元受、中书舍人崔沆、左金吾大将军李道古、右金吾大将军段嶷、谏议大夫柏耆等先后贬来惠州。何志成说：“他们的到来，客观上促进了惠州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

首位到惠的宰相是张锡。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张锡为凤阁侍郎，不久取代其姐姐儿子李峤为相。长安元年三月，张锡因请还庐陵王及漏泄禁中选拔官员消息及贿赂赃银数万被下狱。

入狱时，他骑着高头大马前往刑狱，意气自若；到刑狱后居三品院，帷帐饮食与平日无异。而同时下狱的宰相苏味道前往刑狱时，弃车马而步行，到刑狱后席地而卧，饮食则粗茶淡饭。两者对比，张锡显然过于侈靡。武则天闻讯，赦苏味道官复原职，判张锡当斩，临刑释之，改流惠州。

张锡贬来惠州后，“同是天涯沦落人”、此前就被贬来惠州的诗人章玄同来探望他，并写《流所赠张锡》一诗，诗曰：“黄叶因风下，甘从洛浦隈；白云何所为，还出帝乡来。”神龙元年，唐中宗即位，大赦天下，张锡得以赦还，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

宰相杜元颖则没这么好运，左迁惠州后长眠于此。何志成介绍，杜元颖是唐太宗贤相杜如晦裔孙，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长庆三年充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因以相位出镇蜀州，他削减士卒衣粮，致使戍边士卒越境南诏抢掠自给，诱发南诏蛮兵入侵，交战后又大败，被贬为邵州刺使。蛮将嗟颠又上书唐文宗告状，杜元颖被再贬为循州司马。约三年，病逝于惠州。

第三位宰相牛僧孺在历史上更有名，因党争失利，先后被贬为汀州刺史、循州（惠州）司马。何志成表示，当时惠州城内流传一首诗，据说是牛僧孺贬居时所作。他在闲暇中走到郡廨东边山冈的一个小亭（今中山公园望野亭附近）北望，触景生情作诗曰：“独上江亭望帝京，飞鸟犹需半年程；山水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

专家建议

应加大寓惠官员相关史迹保护力度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提到寓惠官员，惠州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轼，可除了苏轼呢？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多位惠州学者，他们表示，其实寓惠官员名宦为惠州做了很多实事，东坡祠、丰湖书院等众多名胜都是为纪念他们而建的，建议政府加大遗迹保护力度，对以苏轼为代表的寓惠官员多作宣传。

顾炎武在《肇域志》中说：“龙川以东，赵佗作令，故多倔强而焰淫；归善以西，苏轼谪惠，故渐好文而尚礼。”自秦汉以来，惠州便是中原文化的重要接受地之一。东汉僧文简设伏虎台开堂说法，隋代柳旦开设学校推行儒学，这些唐宋大量官员谪惠，明清理学南兴，均对惠州重教兴文带来了直接影响。

崇文好礼，向来是惠州的传统。宋淳祐四年（1244年），州守赵汝驭在惠州银岗岭建祭祀武书院聚贤堂，堂中供奉了与惠州关系密切的十二位儒家先贤，多位谪官亦位列其中。聚贤堂就是后来的丰湖书院。何志成介绍：“谪惠官员们的懿德范行已被转化成儒学教育的思想资源，他们对惠州文化教育的贡献被永远铭记。”

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惠州民俗学者林慧文对谪官文化也十分上心。他曾在各种场合介绍，现在惠城区桥西街道五四路的花都电影院后面一条小巷内曾有个百官祠，唐代宰相牛僧孺就曾在此居住，然而当年的文豪、高官们居住的地方现在居然成了停车场。

“文化遗迹如果不被保护，很快就会完全消失。”在惠州出生长大的林慧文对此感触颇多，“现在的人从小巷经过，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曾有如此多的达官名宦落脚。”

“我建议，最起码在原址立个牌子，让人知道这回事。惠州有600年谪官文化，在全国数一数二。保护惠州传统文化刻不容缓，莫要让类似事情再重演！”林慧文说。

文史杂谈

凄然离京后 他们攀上了文化的高峰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当年南行路上的这种心境，苏轼后来也体会到了。并且，苏轼一生中不止一次凄然离京。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很多士人年轻时都有的梦想，但多年宦海沉浮后，往往撞得头破血流。

因“不合时宜”，他们或贬黜出京，或改任外放。对一心要跻身庙堂“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来说，即便只是让他们赴外任，也会产生失落感。

尤其是遭遇贬谪，会激发他们内心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使得他们开始刀头向内反躬自省。逆境中的生命体验，也使得他们的文化意识觉醒，山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多通过文艺方式倾吐出来，这便迸发出富有张力而灿烂辉煌的人文之光。

这种张力是压抑出来的。被迫远离“庙堂”，身落低位，优越感没了，接地气了，寂静中也听见自己真心了，他们向千年文化靠拢，向古今圣贤靠拢，在不断的探问和追寻中，一步步走向文化和思想深处。

正应了那句老话：“文章憎命达”，也正如司马迁所言，“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苏轼也是在被贬黄州期间，写下了光耀千古的《寒食帖》与《赤壁赋》。

士人的不幸，一方面是乱世或诗人身世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官场政治有关。

千年儒家文化和科举选官制度，使得中国士人都秉持着“修齐治平”之梦，而跃过龙门进入官场后，还有坎坷与波折等着他们。

柳宗元31岁因“永贞革新”被贬，从此流落江湖，邵州、永州、柳州，他再没能回京任职。范仲淹“庆历新政”后被贬，一路邠州、邓州、杭州、青州、颍州，始终处在“江湖之远”；苏轼一生陷在新旧党之间，被贬出京后，黄州惠州儋州，成了他一生的“功业”……

当苏轼南行的小船划过江州，他想起了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江州司马”就曾在这里，写下了感叹身世的《琵琶行》。

一代代士人，似乎重复着相似的际遇，这像是他们的命运，更是他们的使命。超脱豁达如苏轼，有时会想，何妨“一蓑烟雨任平生”“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庙堂之外，他们找寻着自我。

这便有了另一种情形，“处江湖之远”，他们就俯下身，为一方百姓做实事，凿井、修路、筑堤、易风俗……至今在中华大地上，仍留存着“某某堤”“某某井”“某某祠”等遗迹，这是后人给他们立下的丰碑。

当年韩愈几乎抱着必死之心，在人生暮年凄然走向潮州，却在潮州除弊兴利，“赢得江山都姓韩”，百姓至今感念他的恩德。这大概是韩愈写下“雪拥蓝关马不前”“好收吾骨瘴江边”时所不曾想到的。

而一个人的价值闪光，从来都不是他个人独享。这些失意者到来后，用诗文传唱山水风物，让这片土地得以扬名。如苏轼对于惠州西湖、罗浮山及岭南佳果的贡献，谁能抹杀得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名人的到来，对偏远之地的文明开化起到助推作用。有的人办学校，直接开启文教之风。即便啥都不做，仅仅书写传唱诗文，也能带来无穷的榜样力量，带动文风兴盛。

凄然离京，对他们个人来说是命运的挫折，对地方来说则是幸运的际遇。他们在攀登文化高峰的过程中，也把这个地方带到了一定的文化高度！